

H/1-09
20063

港台書

混成與推移

中國語言的文化歷史闡釋

李葆嘉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混成與推移：中國語言的文化歷史闡釋 / 李
葆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87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392)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49-121-1(平裝)

1. 中國語言 - 論文,講詞等

802.07

87000957

文史哲學集成

混成與推移

——中國語言的文化歷史闡釋

著者：李葆嘉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六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121-1

溫成典推移

星琦題



自序

華夏中國，為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之邦。隨著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文化的重大發現，隨著東亞——南洋語言譜系研究的逐步深入，漢語的祖先或漢語的起源這一撲朔迷離的問題成為海內外語言學家和世界漢學界關注的焦點。

從八十年代中期，我開始接觸歷史比較語言學。美國語言學家P. K. 白保羅四十年代提出、八十年代才廣為中國大陸語言學家知曉的澳泰語系假說，把苗瑤語族和侗泰語族從漢藏語系中劃分出去，對於長期奉行漢藏苗瑤侗泰同源說的中國語言學界，震動很大。由此引發了我對探討漢語起源的興趣。1987年看到竟成的《古代漢語元音和諧現象》，論及古代漢語和阿爾泰語的元音和諧相似性。1988年，讀到格勒的《中華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統和民族系統》，論及中華大地上距今五、六千年前的考古文化系統。三大考古文化系統：三大歷史傳說氏族系統：東亞—南洋三大語言系統——在我的腦海中突然一下子貫通。1989年草成《論原始華夏語形成的歷史背景》，初步提出了東亞三大太古語言系統說和原始華夏語是混合語的觀點。儘管白保羅切斷了漢語和澳泰語言的同源關係，但我仍然以考古文化系統和傳說氏族系統相互印證的宏觀背景，推斷原始華夏語和原始南方語有發生學關係。

1991年，從《國外語言學》上看到法國學者L. 沙加爾在國際漢藏語言學會上宣讀《漢語南島語同源論》論文的報導，當時的

2 混成與推移——中國語言的文化歷史闡釋

心情有如門捷列也夫聽到新元素發現的消息。邢公畹對沙加爾論文述評，使國內語言學家了解到漢語——南島語同源假說的具體內容。鄭張尚芳提出華澳語系假說，以之囊括漢藏、南亞與南島諸語言。白保羅的澳泰語系則被包容在更大的語系內。

我仍然沿著自己的思路繼續探索，1993年寫成《天問：華夏漢語祖先安在》，進一步明確提出華夏漢語三元混成發生論，以「混成·推移」修正了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的「推移」說，蒙韓國仁荷大學校中國語學科教授蔡瑛純博士推荐，拙文刊於韓國《中國人文科學》第13輯。蒙臺灣大學文學院陳貴麟先生推荐，拙文同時刊於臺灣《國文天地》。

1994年秋寫成《論漢語史研究的理論模式及其文化史觀》，從文化史角度對當前中國語言學研究中通行的四個漢語史研究理論模式加以評論，並試圖建立「混成發生·推移發展」的理論模式。此後，寫成《中國語的歷史和歷史的中國語》，貫通考古文化學、歷史學、神話傳說學、人種體質學、民族學與歷史語言學諸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七千年中國語史宏觀通論，並提出東亞——南洋語言文化圈假說。通過對華夏漢語作溯源沿流式的、大視野、全景觀審視，以期建立全新的中國語史觀和中國文化史觀。不但以新的模式重親闡釋中國語言史，而且試圖通過闡釋語言史來重建中國文明史或中國文化史。

拙文《中國語的歷史和歷史的中國語》曾寄呈同行暢教。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語言學博士、臺灣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張光宇教授（1995年3月）認為：

這是一篇宏觀綜論的學術論文。就作者所掌握的文獻資料來說，可謂上天下地，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就其駕馭的能力來說，可謂博觀約取，剪裁適度。就作者的創造性思考

來說，可謂繼往開來，嘉惠學界。

在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任教的史有為教授（1995年3月）來信說：

我早年曾有志於音韻與語音史，欲向上溯源。但因工作所限不得已轉而攻現代漢語。如今讀來不禁想起當年理想今已有強手摘取，心中甚是欣喜。

蒙史先生推荐，拙文忝列日本《中國語研究》（1996年38號）首篇，在此深表謝意。

當然，正如有些同行指出：要以論文的形式來呈現七千年間語言的形成、發展和變化，本來也只能提出綱目；若從專論的分析著眼，自不免粗疏。關於中國語的歷史和歷史的中國語這一宏大論題，需要詳加探討的專題比比皆是，拙文更多的還只是體現一種多元思路，一種理論探索，一種嶄新模式。

有一些理論問題值得深入研究。語言發展的動力究竟是什麼？對於歷史語言的研究來說，語言材料本身是否是自足的？漢語是否是一元自變型？

依據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正統觀點，語言發展的動力在語言系統內部。傳統的語言研究比較注重語言的時間區別和語言的地域差異，對社團的語言差異的系統研究則產生了當代社會語言學。語言是人的語言，語主的變化必然引起語言的變化。語言的時間變化是原有語主的世代傳承，語言的空間變化是原有語主的群體遷徙，但是更重要的是語主自身的突然變換即原先語主的中斷。歷史上發生的語言換用過程，對於使用語言的民族來說，是語言的換用；對於換用對象的語言來說，則是語主的變更。因此，語言演變的矢量應當是：時間·空間·語主三維。語言發展的根本動因，不在語言系統的內部，而在語言系統外部，在於語言主體

的局部嬗變及其社會文化的發展。

正像語言系統本身具有自足性和非自足性的雙重性質一樣，語言研究中的語言材料也具有自足性與非自足性的雙重性質。語言材料中的這種雙重性隨著時間的上溯而成反比，即越是古老的語言材料自足性越小，非自足性越大。在漢語音韻學研究中，《切韻》音系的研究僅僅依據《切韻》是不夠的。一個首要的問題就是：《切韻》音系性質是綜合的還是單一的？這一問題只有依據文化與歷史的有關材料才能加以解決。至於《詩經》韻系與諧聲音系，更不是依據自身材料就能懂理情楚的。如果進一步要探索原始漢語或漢語的來源，純語言學方法和歷史比較語言學則根本無法「包打天下」。如果人們探索漢語語源的欲望無法抑制，那麼，除了另闢蹊徑，別無他法。考古學、遺傳學和語言學及有關學科的綜合研究方法，為漢語語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從這一立場來說，針對採用非語言學研究方法來探討原始華夏語的任何指責都顯得毫無意義。

有人認為，漢語應該是一元自變型，它的語音、語法、詞匯系統從整體結構來看，都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一方面，設定漢語是一元來源，則不能解釋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中古代漢語與毗鄰三大語系的複雜關係，則不能解釋周邊語言是黏著類型而為什麼漢語是孤立類型；另一方面，華夏語的單一來源論與近年來中國史前考古文化的多元性左右相悖。處於封閉環境中的語言可能是自變的，但是處於南耕北牧、衝突交融中的華夏漢語則不可能僅僅是自變。事實表明，幾千年來，原始華夏語的來源與演變非常複雜，漢語在同化周邊語言的過程之中也異化了自己，華夏漢語的語言類型經歷了極其深刻的變化。

因此，竊以為：

語言史是廣義文化史或文明史的一部分。一個民族的語言史就是這一民族文化史或文明史的折射與積澱。一種語言的形成演變史與這一民族的形成演變史是平行展開的。語言的史前狀態是非常複雜的。語言的演變因素除了時間、地域，有語言主體，還有語言接觸中的滲透、交融、換用和混合等等。很難設想，一種游移於文化史之外的語史研究模式，一種建立在並不完整的文化史觀之上的語史研究模式，一種得不到考古文化研究成果支撐的語史研究模式，能滿足對這種語言的起源與歷史演變的深入研究。

在《試論語言的發生學研究》中，我提出了語種發生的三種類型：歷時分化發生、共時聚合發生和多元混合發生。在《混合的語言和語言的混合》中，回顧了大陸近年來關於語言混合研究的現狀，論述了混合語言和語言混合研究的理論意義、系統方法和相關問題，以期推動中國混合語言學的建立和混合語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掀起一股「文化熱」（至今未衰），或試圖以西方的文化學方法來剖析中國傳統文化，或試圖以傳統的國學傳統方法來彌合西學東漸以來出現的世紀「文化斷層」，或把興趣投放到中國古代神話的重新闡釋中，或專注於挖掘國民性以尋求誤入歧途的解脫辦法：凡此種種研究，都離不開對傳統文化典籍的釋讀。然而，非常遺憾，一些名噪一時的「宏論」，往往因為缺少扎實的文獻根底而實為皮相之見。「因聲求義」是傳統文獻闡釋學的基本方法，但離開確鑿的語言文獻佐證，僅據聲音妄加臆測，勢必多生謬誤，以致有人把「同音」、「音近」比作「小學家殺人的刀子」或「犯罪的凶器」。然而，一些未曾掌握因聲求義方法的學者卻在大膽放手誤用或濫用「音訓」，致使

「因聲求義」成爲一些錯誤乃至荒唐結論的偽證。因此，我先後寫出了《何新〈諸神的起源〉聲訓辨證》、《論文史研究中的古音偽證》、《論文化研究中的音韻導人》，以期文史研究界引起重視。

受第三屆全國文化語言學研討會組委會的委託，《參予：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當代意識》是我在閉幕式上（1994年1月17日，哈爾濱）的總結發言。作爲海峽兩岸的學人，可藉此了解九十年代中國文化語言學的進程。在「文化語言學：學科抑思潮」的爭論中，竊以爲：

學術思潮具有勃發性、時代性、階段性特徵，沒有經久不衰的學術思潮。現在倡導文化語言學，但不久可能會出現「後文化語言學」或別的「X語言學」。很顯然，儘管學術思潮有別，但只要以語言爲研究對象就是本體語言學之一。在同一時期內從不同角度對語言加以研究的不同學科，可以將其確定爲分支學科，這些不同的分支學科的背後都隱含著種種不同的在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學術思潮。因此，從橫的平面上看，文化語言學是一門學科；從縱的剖面上看，文化語言學是一種思潮。這一思潮不僅是對風行近百年的模仿引進式的描寫語言學的歷史性反撥，而且它蘊涵著一代人心靈的騷動、命運的沉思與價值的抉擇以及期待的否定。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漢語的祖先：回顧與前瞻》）是國際中國語言學會首任會長、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王士元教授爲他主編的論文集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漢語的祖先》）所寫的導論。去年夏天，王先生應邀到南京師範大學訪問。蒙王先生惠贈《漢語的祖

先》，並由黃山來信，約寫一篇關於此書的評論。秋天，我去北京大學從徐通鏞教授做訪問學者，由此研讀書中歷史語言學大家論文，並動筆試譯。11月26日經香港赴臺灣，在啓德機場面謁王先生，呈上《導論》初譯稿，並告之計劃。1997年元月又承王先生賜函，許可我將全書譯為中文並聯繫出版，深為感激。全書中譯本的翻譯與出版尚需時日，故先將王先生的導論刊出，以饗讀者。

1996年11月，我應邀到臺灣進行學術訪問，有幸與文史哲出版社發行人彭正雄先生相逢。次日，彭先生到我們下榻的臺北富都飯店，即相約出版拙稿。在撰著《清代上古聲紐研究史論》時，我閱讀過文史哲出版社的著作，對彭先生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深懷敬佩。在我的學術研究中，一直試圖貫通文史哲諸學科，拙稿能在尊名「文史哲」的出版社付梓，深感有幸，又蒙王星琦教授為之題簽，一併謹申謝忱。

這本論文集記錄了我近年來思考和探索的足跡，本項研究名為「漢語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1996年列為江蘇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在先後撰成的一系列論文中，合編成集時有一些內容便略顯重複。為了保持各篇思路的完整性，編輯時雖做了一些刪削，但仍有贅言。至於文中的一些觀點，則可能「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不足」，誠懇希望得到方家的賜教。

期待著：早日揭開披在原始華夏語這位女神頭上的神秘面紗。

東亭 李葆嘉 公元一九九七年元月十五日於京華未名湖畔

混成與推移

——中國語言的文化歷史闡釋

目 錄

自序	1
試論原始華夏語的歷史背景（提綱）	1
天問：華夏漢語祖先安在——華夏漢語三元混成發生論	5
中國語的歷史和歷史的中國語——七千年中國語史宏觀通論	21
一、引言	21
二、人類有聲分節語言的形成與東亞語言的發生	23
三、三大考古文化系統的出現與三大太古語系的形成	26
四、原始華夏語的混成發生與語言類型的動態演變	29
五、南耕北牧生態格局中的漢語演變軌跡	36
六、明清官話的市民社會內涵及基礎方言	40
七、七千年中國語演變的來龍去脈	48
八、東亞——南洋語言文化圈之假說	50
論漢語史研究的理論模式及其文化史觀	65
一、引言	65
二、評高本漢時間一維直線型模式	67
三、評普林斯頓方言逆推型模式	72
四、評張琨時空二維差異型模式	79
五、評橋本萬太郎地理推移型模式	84
六、評拉波夫語言變異理論和王士元字滙擴散理論	88

2 混成與推移——中國語言的文化歷史闡釋

七、華夏漢語混成發生的文化歷史背景·····	92
八、農牧文明衝突和東亞語言交融·····	100
九、結 論·····	105
試論語言的發生學研究·····	113
混合的語言和語言的混合——論大陸近年來關於語言混合 的研究·····	129
何新《諸神的起源》聲訓辯證·····	153
評文史研究中的古音偽證·····	165
論文化研究中的音韻導入·····	179
參與：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當代意識——第三屆全國文化語 言學研討會述評·····	193
漢語的祖先：回顧與前瞻··〔美〕王士元··李葆嘉譯·····	215

試論原始華夏語的歷史背景（提綱）

(一)東亞大陸新石器時代民族部落文化體系可分為三大系統：處於東南的湖澤水耕文化系統，其考古稱青蓮崗文化系統，動物紋飾以鳥形為主；處於西北的河谷旱耕文化系統，其考古稱仰韶文化系統，動物紋飾以魚形為主；處於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系統，其考古稱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目前所知最早的龍形器即一九七一年在內蒙三星他拉出土的紅山文化玉龍，八十年代又在遼西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現龍形玉飾，距今約五千年）。

(二)東南文化的創造者原始夷越人（包括夷、越、苗蠻、濮），其體質特徵接近於現代蒙古人種南亞型，所操太古夷越語即原始南方語（據本尼迪克特的分類）。西北文化的創造者原始氐羌人，其體質特徵新石器時代一種接近東亞型，一種接近南亞型，青銅時代則接近東亞型（表明南亞人從西北向東南的遷徙），所操太古氐羌語即原始藏緬語。北方文化的創造者原始胡狄人，其體質特徵新石器時代早期一種接近北亞型，一種接近東亞型，晚期混合趨向統一，所操太古胡狄語即原始阿爾泰語。

(三)與考古文化系統相互證發的是傳說中的三大民族系統（約公元前3200到2600年）：興於江淮流域發展到黃河下游的伏羲氏太皞，為夷越人之始祖；興於渭河流域發展到黃河中游的神農氏炎帝，為氐羌人之始祖；興於北方後南下黃河直至江漢的則是軒轅氏黃帝，蓋為胡狄人之始祖。

(四)黃帝為胡狄據以下材料推測：(1)黃帝族是從北方發展起來

的，黃帝初都涿鹿，後遷有熊，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今寧夏、山西、河北北部遠古為北方細石器文化，屬胡狄游牧之域。(2)黃帝族「遷徙無常處」，是北方游牧部落。(3)黃帝與蚩尤戰，蚩尤適應東南氣候請風伯雨師。黃帝請旱神女魃，反映黃帝適應北方乾旱環境。(4)傳說認為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黃帝之后白犬生犬戎。(5)黃帝後裔有夏后氏，夏禹人稱「戎禹」，匈奴稱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6)馬車是北方游牧民族發明的，傳說黃帝造車，號軒轅氏。

(五)三次大規模的原始部落戰爭促成了華夏族的形成。(1)夷羌之戰，共工（炎帝系）與蚩尤（太皞系）戰，共工敗。「乃說於黃帝」，北上求援，結成炎黃聯盟對付蚩尤。(2)夷狄之戰，黃帝擒殺蚩尤於冀州之野，並令少皞統領夷人各部。(3)羌狄之戰，炎帝爭奪盟主地位，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三戰，然後得其志」。勝利後的黃帝乘勢向南大發展，進居黃河流域，又到江漢，「五十二戰而天下咸服」。黃帝的勝利奠定了原始華夏族的基礎。

(六)經顓頊（夷越系）、帝嚳（夷越系）、堯（胡狄系）、舜（夷越系）、禹（胡狄系）的統治，華夏族在中原黃河流域形成。同時，由原始氐羌語、原始夷越語、原始胡狄語融合成原始華夏語。

(七)商人（夷越系）甲骨中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其順行結構（修飾語在後）為南方語系之特點。周人（其姓姬，為黃帝姓，其祖母姜嫄，蓋氐羌與胡狄混血）來自西北，春秋時人名多稱乙公、丁公，地名「城濮」保留了順行結構。周秦的統治使古華夏語「氐羌化」，出現了氐羌色彩較濃的以王畿一帶方言為基礎的華夏交際語「雅言」，周人自稱「有夏」，故有人釋「雅」為「夏」。沒有融合同化的狄、戎、夷、蠻，則被

華夏視為異族，於是有夷、夏之分別。

(八)構擬周秦古音，持複輔音說者，則多從氐羌、胡狄語言系統出發；持陰、陽、入皆有輔音韻尾說者，則多據現代南方語言。古代華夏漢語的異質性被方塊漢字掩蓋了。由於遠古漢語或原始華夏語的這種異質性與聚合性，構擬祖語成為實際上不可能的事。

(九)秦漢以後，以三次大動亂（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亂）為高峰，北方游牧民族逐鹿中原（大有步黃帝遺踵之勢），建立王朝。從始皇統一至清帝遜位2132年間，北方民族統治中原或全國達840年；隋唐皇族有鮮卑人血統，故能容納西域文化，統治326年。而中原土族大量南遷；於是出現了中原北留漢語的阿爾泰化與南遷漢語的南亞化（或中原漢語與南方土著語言的融合）。由此形成了橋本萬太郎所描述的那種東亞大陸語言結構連續體的狀態。

(十)原始南方語、藏緬語、阿爾泰語互相在中原地區混和形成了原始華夏語。秦漢以後中原漢語阿爾泰化，南遷漢語則南亞化。從華夏文明形成的多元論、華夏語言形成的聚合性出發，華夏文化和華夏語言的研究可望有新的進展。

一九八八年草於古南都三色齋

（原刊於武漢《語言學通訊》1990年1—2合期）

4 混成與推移——中國語言的文化歷史闡釋